



国防大学 2 071 0232 0

文史资料选辑

合订本

第 32 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大革命洪流中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黄琪翔(1)
回忆张自忠将军	张宗衡(10)
章太炎先生东京讲学琐记	任鸿隽(67)
章太炎先生晚年在苏州讲学始末	任启圣(70)
忆东南大学讲学时期的梁启超	黄伯易(76)
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	周作人(88)
科场回忆录	钟毓龙(104)
附录：科场续记	(143)
《辞海》创刊的经过	金寒英(153)
冤狱回忆	高秉坊(165)
高秉坊“贪污案”内幕	杨 铎(184)
高春如冤狱记书后	章士钊(197)
北京梨园谈往	纳 莽(199)

关于《孽海花》的一些史料…………… 万 武 徐养疾(214)

质疑·补充·订正

对《我所知道的陈独秀》的订正两则…… 李永璞 陈长松(219)

对《蒋介石下野回溪口的见闻》的订正和质疑…… 陈瑞麒(222)

大革命洪流中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黄琪翔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正式和共产党合作，使中国革命走上了新的阶段。一九二五年，广东革命武装力量在共产党支持下先后肃清了陈炯明、杨希闵、刘震寰等粤、滇、桂军阀，统一了广东，成立了国民政府。跟着，广东各军一律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仿照苏联办法，在军中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当时参加政治部工作的主要干部，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由于他们的政治领导和模范行动的影响，军队的精神面貌起了一定的变化，战斗力大大增强了。

—

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第四军进入了湖南。参加的部队有陈铭枢的第十师和张发奎的第十二师，由副军长陈可钰统率指挥。当时任团长的，第十师为蔡廷锴、戴戟、毛维寿；第十二师为叶挺、黄琪翔、缪培南。叶挺部队原为第四军独立团，它是一支新成立的革命部队，军事和政工人员均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战斗力较强。独立团先于五月间作为选遣部队挺进湖南，支援唐生智第八军作战，八月间在湖北境内从汀泗桥战役开始，归第十二师指挥。

在军队实力上，第四军共六个步兵团，兵员约一万余人，装备很差。

面临着强大的北洋军阀，北伐军的战斗任务是艰巨的。但当时反帝反封建的群众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国共合作，民心振奋，士气高昂，特别是军队对战争的革命正义性有了初步认识以后，胜利的信心异常坚定。军队进入湖南境内后，当地农民组织到处欢迎慰劳，并帮助运输、带路、送信、担担架……这种支援和鼓励使军队在物质和精神上增加了一股想象不到的力量。

第四军于八月中旬通过醴陵、浏阳到达平江。平江之战是第四军第一次和北洋军阀交锋。八月十九日拂晓我军向平江之敌发起攻击。农民组织自动配合军队参加战斗，使敌军防不胜防。我军依靠农民协助，进展很顺利。激战半天，敌军全线崩溃。我军以极小伤亡，取得很大胜利。我率领三十六团部队绕道从平江城东边攻入北门，直捣敌军司令部，大出敌军意外。敌军指挥官平浏镇守使陆运仓皇失措，连逃走都来不及了。他用手枪自杀而死，躺倒在办公室里。

在此以前，第八军和独立团已击败了赵恒惕军，占领了长沙，向岳州推进。敌军向湖北方面败退。

八月下旬，左翼第七、八军和独立团已与右翼的第四军取得联络，向湖北推进。第四军通过了通城、崇阳，于二十五日到达汀泗桥附近。汀泗桥是湖北境内粤汉铁路上的军事要隘，南、西、北三面环水，东面是高山，易守难攻，历次军阀内战，均为必争之地。直系军阀吴佩孚部队在此设防的不下二万余人。

八月二十七日第四军配合左翼的七、八军对汀泗桥发动猛烈攻势。吴军据守有利阵地，拼死抵抗，以机关枪和大刀队组织“督战队”，在自己的阵地后方把守，防止退却。当天战况十分激烈，直至黄昏，战局仍未能解决。此时我方得到情报，吴佩孚亲率增援部队已越过武昌南下，将抵贺胜桥；同时，江西的孙传芳亦有派兵袭击我后方之势。局势相当严重。

第四军在右翼高山地带作战，任务较重，苦战一天，进展困难，一时处于胶着状态。晚上约八点以后，我到指挥部找到了师长陈铭枢和俄国顾问尼纪金，研究战局。我向他们提出了下面的意见：根据具体情况，我军士气旺盛而装备不良，勇于进攻而不长于防御；敌军情形则完全相反。今夜如不能彻底解决战局，明天吴佩孚援军到后，必将大举反攻，使我陷于被动；加上孙传芳军在后方的威胁，前途十分可虑。我建议不顾任何牺牲，当夜实行全线夜袭，突破当前高山阵地，以挽救危局。这个意见受到了他们的重视，并立即采取措施，下令各部队对当面敌军阵地实行夜袭。叶挺表示决心，当夜一定要拿下汀泗桥。十点以后，我军全线同时突击，枪声杀声，震撼山谷。到了拂晓，终于突破了汀泗桥阵地。我军登上山头后，发现无数死伤在战壕里的敌军，大部负有白刃战的刺刀伤，足见战斗激烈程度。

二十八日我军乘胜追击。在进军中发现沿铁道两旁的树上悬着无数敌军人员的头颅；淹死在湖沼地带的敌军尸体亦数以千百计，令人不堪逼视。这就是吴佩孚军督战队的“战绩”。

独立团于击破当面敌人后，担任先锋，首先占领咸宁，直趋贺胜桥。这时吴佩孚已经亲自指挥增援军赶到，扼守贺胜桥阵地。但吴军在汀泗桥惨败之余，无心恋战，经我军再度猛攻后，纷纷溃退。第四军于八月三十日占领贺胜桥。

第四军乘贺胜桥战胜余威，马不停蹄，跟踪追击，九月一日便到达武昌城郊附近，原以为可以不攻而下。事出意外，吴佩孚派其师长刘玉春据城死守。

我军稍事整顿，次日即开始攻城。第四军每团各派一营兵力，编成“攻城敢死队”。在当时士气特别旺盛情况下，几乎每个官兵都抢先争取参加这个光荣队伍。有些敢死队成员最后是以抽签方式决定的。

自从广东出发以来，我军长途跋涉，历经平江、汀泗桥、贺胜桥多次战役，受到了一定的损失，战斗力较前有所减弱。又因

缺乏现代化的攻城装备，主要靠从民间征发来的梯子爬城，屡次强攻，均未奏效，战斗一时陷于停顿状态。但第八军一部已于九月上旬占领了汉阳、汉口，截断了吴佩孚后路，使武昌敌军腹背受敌。我军一面围城，一面补充整顿，到十月间，实力大增，再次发动攻势。十月九日独立团正面保安门地道爆破作业完成，当夜出敌不意，全线同时总攻。地雷爆炸后，该团在缺口处首先登城，多部亦陆续跟进^①。十月十日革命军攻下了武昌城，俘敌守将刘玉春。武汉方面战事基本结束。

二

北伐战争的胜利，带来了政治上的危机。代表工农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共产党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翼反动派的斗争日趋尖锐了。

一九二六年十月间从迁都问题开始，这个斗争表面化了。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会议，接受了共产党人的要求，决定迁都武汉，这是适应于当时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的。但蒋介石阴谋叛变，为便于使自己对政府的控制并实行独裁，主张迁都南昌。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密切合作下，斗争结果，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终于在十二月间迁到了武汉。蒋介石对此坚持反对，逐渐暴露出他的反革命面目。一九二七年三月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后，武汉国民政府事实上和蒋介石已正式破裂。此时，第四军已扩充为第四军和十一军。

为了打破当时的困难局面，一九二七年四月武汉政府决定进行第二次北伐，迎击由河南南下的奉军张作霖所部。五月间，我率第四军十二师作为先遣部队，首先进占河南驻马店。

^① 据范汉杰回忆，“攻占武昌时并未爆破开城墙，而是吴佩孚部贺师起义，打开城门，让第四军入城的。”录此，供参考。——编者

由张学良统率的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团，装备优良，号称精锐，兵力约五万余人，沿京汉铁路南下，在许昌漯河附近设防。我军参加这次战役的部队，除第八军一部外，主力为第四军、第十一军和贺龙、杨其昌两个独立师。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亲临前线指挥作战。

五月中，我军集结完毕后，开始北进，先声夺人，驻上蔡的奉军富双英师不战而降。我军在东西洪桥附近与敌接触，敌军且战且退，直至逍遥镇、临颍地区，我军才和敌主力展开会战。这次战役，双方兵力约计八万余人。四军、十一军此时装备训练均比前有所改善，士气尤为旺盛。经三昼夜激战，终于击退了奉军，直取开封。

但是，在这一年中，政治上斗争十分复杂、激烈，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第四军的前途。

第四军部队，除独立团有比较强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担任军事和政治骨干，是一个真正的新型革命军外，其余各团队也有不少党团员担任政治工作。这些党团员在军队中是深得人心的。他们平时做政治训练工作和群众组织工作，战时则冲锋陷阵，奋勇争先，受到了官兵们的爱戴。在整个北伐战争时期内，他们的工作是有成绩的。第四军的战绩和他们的成绩分不开。但是，他们的工作只是一般的政治工作，而不是深入士兵群众的工作，因此其基础又是不巩固的。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以后，蒋分石完全投入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怀抱，公开反共，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与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大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在此以前，武汉政府为了反蒋，错误地把汪精卫从国外找了回来。汪以假左派面目出现于武汉，担任了国民政府政治会议主席，这不啻为国共进一步分裂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同时共产党内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领导出卖革命，一面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问题有关指示如土地革命、武装工农、改组武汉政府和国民党等重要秘密告诉汪精卫，

一面又在党内作出投降主义的决议，命令在军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无所作为地退出了革命，助长了反动派的气焰，给汪精卫提供了有利的反革命条件。与上海广州四月间开始的反共大屠杀相呼应，武汉方面汪精卫集团也早已积极进行反共活动。六月间，第四军结束了第二次北伐回到武汉以后，政治形势大变，当时反共高潮已经蔓延到武汉，国民党右派大事辱骂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还说什么“共产党篡夺革命领导权”，在军队中造成了思想混乱。

武汉政府的第二次北伐，是在蒋介石策动四面包围，反动派乘机造谣破坏，帝国主义又用尽方法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施加压力，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被迫进行的。这次战役配合陕西的冯玉祥国民军共同作战。冯玉祥于一九二六年由苏联回国，在绥远五原誓师，率国民军占领陕西，当时他表示赞成革命，并主张讨伐蒋介石，支持武汉政府，受到了武汉政府的重视。武汉政府第二次北伐的作战计划是联合冯军，消灭奉军，会师中原，以稳定武汉政权，扩大革命力量，再行相机讨伐蒋介石。但是，冯玉祥在这个革命重要关头，倒向了蒋介石。

第二次北伐战役，我军付出了一万余人伤亡的代价，击退了奉军，把河南地盘无条件地交给了冯玉祥。六月间，奉命开回武汉。此时我们对于所谓国共纠纷已有疑虑。当军队列车开到郑州的时候，汪精卫、孙科、邓演达等乘坐的专车也恰好停在该站。我下车找邓演达谈话。邓说他们此行是专为迎接冯玉祥到武汉去开会的。这说明他们对于冯玉祥仍寄以希望。我回到武汉后知道，冯玉祥拒绝到武汉，就在郑州开了一次会议。对郑州会议的内容，当时我们毫无所知，但冯玉祥已开始反共，对武汉政府表示不满，则逐渐成为公开的事实。冯玉祥从此不再支持武汉政府了，他不久竟往徐州和蒋介石会见。这样，武汉政府迅速趋于瓦解。很明显，汪精卫和冯玉祥的行动都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连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也完全没有预想到。国共分裂终于成为事

实了。

三

国共分裂后，四军、十一军仍盲目拥护武汉政府，实际上已开始走上支持汪精卫集团的反动路线。这是四军、十一军命运的转折点。“七一五”分共会议后，武汉政府以讨伐蒋介石为名，计划东征。四军、十一军和贺龙的二十军编成第二方面军，张发奎任总指挥，率军沿长江南岸东下。此时除二十军外，各军的共产党员已被迫离开，全军士气日趋低落，官兵们对革命失去了信心。他们对东进讨蒋也不再感兴趣，多数人希望在东进途中经过江西，折回广东，再作打算。军次九江，张发奎看出这种普遍存在的思想情绪，和汪精卫商量后，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就东进讨蒋与回师广东问题征求意见。结果大多数人都主张回师广东。就在这时，共产党在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等人主持下，以二十军为主力，在南昌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举行了八一起义。

八一起义瓦解了第二方面军。参加起义的有二十军全部和十一军大部。约五个师。驻在九江附近的第四军十二师、二十六师、二十五师一部和教导团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完全陷于孤立混乱状态。东进讨蒋当然谈不上了。最后决定仍按原计划回师广东。张发奎于是离开军队，把职务交由黄琪翔代理，自己由海道先回广东，就军队回粤问题，想取得李济深的谅解。第四军对起义军采取“互不相犯”的姿态，约八月十天左右进驻南昌。

李济深在起义军入粤威胁下，以“慰劳”名义派前四军副军长陈可钰来到南昌，表示欢迎四军回广东整训。实际上他是希望四军回粤和广东军一起对起义军共同作战的。八月二十日前后，第四军由南昌出发，经樟树、吉安，沿赣江南下。九月中旬，回到了广东，分驻广州近郊和惠州、石龙、韶关各地。此时叶、贺起义军已进入广东东江、潮汕地区，与李济深军在激烈战斗中。

某日，李济深为派遣第四军参加对叶、贺作战问题，亲自找黄琪翔商量，引起了一场争辩。当时南京方面蒋桂两系暗斗结果，蒋介石一时宣告下野。南京政府在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西山会议派控制中。李济深要求黄琪翔出兵东江参加作战，黄提出交换条件，要求李领衔通电反对南京政府，并在广州召开一次国民党中央会议，重新组织政府，继续“革命”。这次会谈以李黄两人相互不愿接受彼此要求，结果不欢而散。原来南京特别委员会的后台老板是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而李济深是桂系的老大哥，他们的政治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

张发奎和汪精卫先后由上海回到广州酝酿召开国民党中央会议，成立政府，但李济深坚决不同意。第四军将领支持张、汪的主张，但又认为李济深是多年“老上司”，不愿和他兵戎相见。于是进行了一次“护党运动”的政变，驱逐李济深。十一月十六日张发奎、黄琪翔以请汪精卫、李济深前往上海商议国民党重新团结合作为理由，用兵舰把他们送走。当天晚上便发动了反李济深政变。这是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内部公开争权夺利的重大事件之一。

“护党运动”是没有任何群众基础的，它在政治上已经完全破了产的汪精卫摆弄下，既要反共，又要反南京政府，不可能有任何正确的政治主张。但是，它在国民党内部也确实引起了一番混乱。当时蒋介石在日本，马上派宋子文回到广州联络，表示支持。同时，南京方面也动摇起来，给蒋介石造成了复职机会。李济深认为第四军的行动是“犯上作乱”，大兴讨伐之师，调动广东、广西、福建各省军队，包括陈济棠、黄绍竑、陈铭枢等所部，从东西北三面包围广州。为保卫广州，张发奎把所有可能调动的作战部队全数派赴东西江前线，只留教导团在市区担任警卫，认为这样足够维持治安，并派黄琪翔任广州卫戍司令。这就在客观上给后来的广州公社起义造成了便利条件。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日爆发了广州公社起义。

正当第四军集中全部力量准备对李济深作战的时候，在东江失败了共产党人陆续经过香港，回到广州。当时四军内部对此看法不一。有人认为必须提高警惕，注意他们的行动，以防有变；有人认为当前首要任务是对李济深作战，共产党刚刚失败，不可能有甚么行动。十二月十日深夜，在我广州市东山寓所里，突然传来了远远的密密的枪声。跟着，电话响了。我拿起听筒，听取军司令部副官叶简修的报告。他说，不知何故，军部附近有人开枪，有向军部进攻模样，并问我如何处置。我当时推测是四军内部“兵变”。电话断了。枪声更密了。我意识到情况严重，不能再留在家里，于是走向楼下，把同住的张发奎唤醒，和他一起离开住所。我们走到江边，雇了一条小艇，直奔河南李福林第五军司令部。此时天已大白，才知道是共产党暴动。但河南北交通断绝，情况不明。我建议李福林派兵收复广州，李拒绝接受。张发奎和我随即以总指挥和军长名义，电调东西江薛岳、缪培南、李汉魂、黄镇球、许志锐等部队回师广州，进行镇压。第四军部队陆续回到广州，与在叶挺指挥下的工农红军激战三天后，终于把广州公社起义镇压下去了。一部分起义军被迫向广州市郊撤退。广州公社终于失败了。张发奎和我乘“江汉”轮由河南回到广州。当时广州市内秩序完全陷于混乱状态，英勇的工农红军在战斗中遭受到重大的伤亡，市民生命财产同时亦遭严重损失。就这样，在北伐战争中曾经为人民所称道的第四军最后以走上反对革命之路而结束了它的历史。我作为当时的第四军军长，是责无旁贷的。

一九六五年

回忆张自忠将军

张宗衡

我和张自忠将军既是师生关系，又是长官和部下关系。一九二二年，冯玉祥先生督豫时，我入伍当学兵，我们的营长就是张自忠。后来他任学兵团团长、第五师十五旅旅长，我跟他当班长、排连长；他任二十八师师长，后改为整编师二十五师师长兼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及开封警备司令，我随他任少校参谋、中校参谋处长及军校教育处长、营长、团长、副旅长。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任五十九军军长、二十七军团司令官、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五战区右翼兵团司令官，我跟他任旅长、副师长。直到一九四〇年他在抗战中捐躯殉国后，我由陆军大学毕业，才离开那个部队。对他有所了解。但时隔多年，追述往事，难免挂一漏万。如有不当之处，尚希读者予以指正。

一、投笔从戎

张自忠将军号彦忱，一八九一年农历七月七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县唐家园村。家有兄弟姐妹七人，他排行第五。

一九〇四年，张自忠跟随父母在江苏省赣榆县读私塾。当时，他父亲张树桂任赣榆县巡检，有政声。一九〇六年，他随四兄自严回到家乡。后来，父亲病故在任上。他由母亲做主，于一九〇七年与本县县议局议员李化南之女李敏慧结婚。次年考入临

清高等小学堂读书。一九一一年，就读于天津法政学校。第二年又转入济南法政专科学校就读。

张自忠在校读书时，看到军阀混战，国家贫穷落后，受帝国主义者欺压，为列强瓜分，产生了强烈的爱国之情。他认为只有投军才能报国，乃于一九一四年秋，由济南到奉天新民屯投奔车震。

车震也是临清县人，与张自忠的三兄自清相识，当时在新民屯二十镇（即师）三十九旅八十七团任团长。那时当兵，拾煤拾米，相当艰苦。同去六人，五个人都不堪其苦，离军返乡了。张自忠立志报国，不怕劳苦，深为车团长赏识，不久即提为司务长。一九一五年，随车部步行数百里，开赴绥远丰镇。一九一六年又随军移驻湖南岳州。时车震升暂编第一师师长兼岳州镇守使，升张自忠任师部参谋。后因军阀混战，车部被击溃。车震乃解甲归田。张自忠流落无着，幸遇同乡资助路费，才返回故里。

二、投效冯玉祥先生

车震赏识张自忠青年有为，于一九一七年乘去天津办私事之际，亲自携张去廊坊，把他介绍给冯玉祥先生，冯留他在所奉十六混成旅当差遣。后随冯部开赴浦口、武穴等地。一九一八年又开赴常德。一九一九年入教导团学习，当时鹿钟麟为教导团团团长。因学术兼优，张自忠被冯先生誉之为“标准学员”，训练期满后，升任连长。一九二〇年冯先生兼任常德镇守使，委张为旅部上尉副官。四月，调升为水上陆战队第二队队长，驻防河淤训练新兵。后调至常德城内，将所部拨至工兵营，另拨二百名新兵归他训练。七月开赴湛家矶。九月调四团二营五连任连长（营长是佟麟阁）。后调为旅部学兵连。他所带领的连队，考绩为全旅第一，号称模范连。

一九二一年五月间，冯先生随二十师阎相文部入陕。击败陈

树藩后不久，十六混成旅扩编为十一师，冯为师长。学兵队队长冯治安调升营长。张自忠以骑兵营副营长的职务兼任学兵队长。同年九月，陕督阎相文因军饷无着服毒自杀，冯奉命督陕，乃成立卫队团。第一营为手枪营，营长李向寅；第二营营长为石友三；张自忠任第三营营长，辖四个连（九、十两连为学兵连，十一、十二两连为普通连）。

一九二二年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驱逐赵倜，任河南督军，扩充部队，成立学兵团，冯亲兼团长，下编步兵科四个连为第一营，骑、炮、工、辎各一连为二营。张自忠以善于训练部队著称，但因资望不够，以第一营营长名义兼管骑、炮、工、辎共八个连的训练。实际上整个学兵团均由他负责。是年秋，冯调任陆军检阅使，部队开赴北京通州、南苑一带驻防，学兵团驻北京，一九二三年春移驻南苑。石敬亭参谋长兼学兵团长和教育长。张自忠在石领导下负责训练和管理。当年五月，石敬亭率领学兵团、手枪营到卢沟桥挖永定河。在张自忠的带头号召之下，官兵吃苦耐劳，提前完成任务，为接班的挖河部队树立了榜样。

那时，卫队营与学兵团同住一个营垣内，该营官兵纪律差，言行粗野。石敬亭把卫队营长张凌云调职，曾一度调张自忠整训卫队营，才稍有好转。后调冯治安继任卫队营长，张又回到学兵团任职。

一九二四年春，张自忠升任学兵团长。第一营营长为鲁崇义，第二营营长为吴宝善。是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夕，卫队旅成立。以孙连仲为旅长，辖两个团：学兵团编为第一团，张自忠为团长；卫队团编为第二团，冯治安为团长。战争开始，冯玉祥组织国民军“班师回京”。卫队旅第二团首先进入北京，囚禁曹锟，活捉李彦青。张自忠率领的第一团由古北口直趋长辛店，截击吴佩孚的交通兵团，迫使其缴械投降。战事结束后，学兵团住北京旗檀寺。被拘留的张敬尧、俘虏的旅长潘鸿钧、被逮捕的李彦青等均由学兵团看押。后来张、潘获释，李彦青因克扣军饷和

武器被押赴天桥枪决。

段祺瑞上台后，发表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卫队旅旅长由冯治安升任，驻防张家口。张自忠仍任学兵团长。原来在开封招收的学兵，都已分发各部任班排长职务，这时的学兵是新招来的。他与冯治安私交虽厚，但在官兵面前，对冯诸事服从。一九二五年，石敬亭任第五师师长，张自忠为第五师十五旅旅长，驻包头训练新兵。辖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营。我在二团一营一连任排长，后调回卫队旅学兵团二连任排长。

三、雁北作战

一九二六年，直奉军阀组成讨赤联军，对冯玉祥的西北军发动进攻。冯部被迫退守热、察、绥，固守南口。冯玉祥为转移目标，保存实力，于一九二六年一月通电下野，企图缓和直奉军的进攻。但终化为泡影，他旋以游历为名，携重要幕僚三四名，于三月间由平地泉出发，经库伦转赴莫斯科。

继由张之江任西北边防督办，部队亦由张指挥。此时山西阎锡山趁火打劫，陈兵晋北。致冯玉祥部腹背受敌，并截断了冯部通向西北的交通补给线。西北军按既定的作战方针，把部队区分为东西两路军作战。石敬亭因随冯先生去苏联，他的第五师三个旅配属东西两路军作战。东路军总指挥鹿钟麟。西路军总指挥宋哲元，辖第六军韩复榘部、第五军石友三部。第五师十五旅张自忠部（三个步兵团，骑、炮各一营）归石友三指挥。石友三和张自忠部攻下左云、右玉后，直趋雁门，晋军望风披靡。迨晋军逃回雁门后，深沟高垒，凭险固守。石友三屡攻雁门不下。张自忠奉命守桑干河左岸。斯时，多伦失守、南口告急，石友三部攻下的县城多半丢失。冯玉祥去苏联未归，群龙无首，内部失和。韩、石之流认为大势已去，别有用心另谋出路，企图混水摸鱼，抓别人的队伍来壮大自己。石敬亭、张自忠不是西北军的嫡

系，在这种情况下，张自忠就陷入危境。当时宋哲元任总司令，韩复榘是前敌总指挥。石友三向宋、韩诬陷说，“马邑”失守，张自忠拥重兵而不援救，请予严办！张自忠得知后，和四十五团团团长张骏（现名张知行，国务院参事）过桑干河侦察敌情时，在前沿哨所向张骏团长说，石友三想要陷害他，如不走必被韩、石杀害等语。遂只身投晋，被十五旅四十四团团团长薛家斌发现报告了韩复榘。石友三命开炮射击张自忠当时所在的晋军指挥所和哨所。张骏团长带桑干河前沿阵地防守的骑兵营的两个连和营长李兆镛（后任三十二军商震的师长及副军长）亦随同旅长张自忠投见晋军总司令商震。

南口失守后，韩、石投降晋军。韩复榘部被改编为第三师，石友三部改编为第六师，张自忠的第十五旅仍属石友三，都驻防绥远归化城一带（即呼和浩特）。张在投晋军商震后，一直在太原赋闲。

冯玉祥在苏联得知南口失守后，当即归国，回到五原收拾残局，重整旗鼓。把师改为军，旅改为师，团改为旅，每旅辖步兵三个营，壮大声势。五原誓师后，冯部经宁夏、甘肃直趋陕西。西安解围后，冯玉祥了解了张自忠被迫出走的经过，立即命参谋长石敬亭派人持函到山西与商震联系，要张自忠回来，将寄以重任。商震欣然派人送张自忠返回西安。当石敬亭陪同张自忠见冯时，张哭诉苦衷，冯对他倍加慰勉，要他安心工作，任为总司令部副官长。石友三因作了亏心事，怕张报复，遂派肖振瀛送金兰谱一份以求和好。一九二七年五月间，冯部出潼关到了郑州，调张自忠任二十八师师长。二十八师担任卫队师的任务，保卫冯的总司令部及后方的治安。

四、在北伐战争期间

一九二八年五月间，北伐战争正激烈的时候，陕军岳维峻、